

# 反对派中的“战斗机”

本报记者 张榕博

## 刘师培：“保存国粹”

一百年前，章太炎与蔡元培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大人物合起伙来，都没有劝住一个人“倒退复古”，他就是经学大家刘师培。今天的人们会说，这刘师培咋这么不识趣，为啥非要逆时代潮流，跑到历史“垃圾站”去淘宝呢？

这事儿说来话长。刘师培出生于江苏仪征的经学世家。青年时，他已经是兼收吴、皖两派的一代“通儒”。可1900年，中国的世道变了。刘师培最终咬了咬牙，投靠了老友章太炎的革命派。但革命派让刘师培搞暗杀，写推翻帝制的檄文，这让刘师培很不开心，早早就与孙中山产生了裂痕。得罪了革命党的刘师培，先后投靠了清廷与袁世凯，稀里糊涂做了袁世凯称帝的“六君子”之一，为后人所不齿。

其实，刘师培对政治并无兴趣。辛亥革命后，他表示自己本想重振国学，但力不从心，只企望返回家乡。

1919年，刘师培终于如愿成为一名老师。在蔡元培与陈独秀的努力下，刘师培幸运地进入北京大学任教。由于他国学素养深厚，他所编写的讲义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很受学生欢迎。

但当时的北大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，眼见周围都是冲击传统经义的新文化，不甘附和的刘师培又纠集部分守旧师生，于1919年1月成立“国故月刊社”，掀起了“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”的旗帜，希望保留一块国粹阵地。

面对这一情势，由李大钊、陈独秀、胡适和鲁迅支持的北大进步学生组成了“新潮社”，针对“国故社”的行为，提出了“整理国故”的口号。两大学派虽然观点针锋相对，但刘师培本人却认为“保存国粹”并不意味着排斥新思潮，两者可并行不悖。同时他力主“会通”中西学术，取长补短。在《国故》中，刘

刘师培、辜鸿铭曾是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“反对派”。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家，他们在这场运动中为时人和后人提了一个醒：什么样的革命才值得坚持？一味信奉西方真的能够拯救中国吗？



辜鸿铭

扫码看视频——对话辜鸿铭



记者：辜老爷子，最近美国通过了同性恋法案，里面引用了孔子的观点，您怎么看？

辜鸿铭：Hum，同性恋，这是一个茶壶配一个茶壶的问题，你们现代人真会玩。我只研究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碗的问题。

师培先后发表了《礼经旧说考略》等学术文章，并没有攻击新文化，甚至连与此相关的议论也没有。

可惜的是，当时无论教师还是学生，都将他视为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的顽固、守旧一方的代表。

无奈，在种种误解与唏嘘中，刘师培于1919年病逝。他虽然公开背离过“革命”，被认作“倒退复古”，但他的为人立场至今被奉为异类怪谈。所以20世纪初西方学者这样评价这位东方文化怪才：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，却不可不看辜鸿铭。

## 辜鸿铭：当世“学霸”

与刘师培的“躺枪”不同，今天被称作“学贯中西第一人”的辜鸿铭却是主动求“关注”的。他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保守势力最坚固的“堡垒”，而他的为人立场至今被奉为异类怪谈。所以20世纪初西方学者这样评价这位东方文化怪才：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，却不可不看辜鸿铭。

1857年，辜鸿铭出生于马来半岛。他是中欧混血儿，因此自称：“生在南洋，学在西洋，婚在东方，仕在北洋。”

20岁时，辜鸿铭便拿到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。同年，他又跑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求学，改学土木工程。那时的辜鸿铭已精通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、拉丁文，还有好几个博士学位，俨然一个当世“学霸”。

不过，虽然通识这么多西学，辜鸿铭的骨子里却满是中国传统的精髓。

在前往北京大学任教前，他在张之洞的幕府干了20年。正值洋务运动鼎盛时期，在一片“西学东渐”的呼声中，辜鸿铭发现欧洲人翻译汉学作品错误百出，甚至一些汉学家根本不靠谱，由于阅读了这些不靠谱的译作，西方人根本无法理解东方人的“灵魂”，以至于无理地歧视中国人。

于是，辜鸿铭开始在国外用外文介绍中国与中国文化。从1901年

至1905年，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172则《中国札记》，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，他还将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译成英文，相继在海外刊印。

1915年，就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号召青年向西方文明学习时，辜鸿铭的《中国人的精神》在欧洲出版。时值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辜鸿铭向欧洲人表明，西方的物质文明可能导致世界大战这样的人类灭亡，而东方的道德文明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。

当辜鸿铭在北京使馆区东交民巷演讲《中国人的精神》时，各国使节纷纷前来购票倾听。据传，当年听辜鸿铭演讲，票价高过“四大名旦”之一的梅兰芳，听辜的演讲要二元。

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对西方文明的“热恋”中，但辜鸿铭认为，既然中国努力学习的西方文明竟然出现了“野蛮”之举，那东方文明为何要急于丢弃？

于是，北大成了辜鸿铭“海外战场”后的下一个战场。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，他是见招拆招。胡适授课西方哲学，辜鸿铭便评论：西方哲学诞生于德国与希腊，胡适既不懂德语，也不懂希腊文，完全靠译作讲学，是糊弄人。

对于“五四”学生运动，辜鸿铭更是看不惯，他在外刊上撰文讽刺，青年人上街游行是跟“野蛮人”无异。

不过，辜鸿铭并非维护晚清的保皇党。1919年，复辟将军张勋六十五岁生日时，辜鸿铭送来一副贺寿联，上联是“荷尽已无擎雨盖”，下联是“菊残犹有傲霜枝”。意思是清朝灭亡了，那顶官帽已经全无着落，但还留下一条好端端的辫子。

新文化运动中的辜鸿铭就像一个既无所不知，又看透世情的人，没有人愿意与他争辩，也争辩不过他。但面对如何完成近代中国民族独立、国家富强这两大历史任务，辜鸿铭也显得无可奈何，只能在“西化”风潮来临时，为东方文化辩护。

# 康梁保守派：文化不是衣服 想换就换

本报记者 张亚楠

新文化运动中，有一拨人曾经是弄潮儿，后来却成为年轻人心里半新不旧的人物，就像傅斯年对杜亚泉的评价：“你说他旧么，他却像新的，你说他新么，他却实在不配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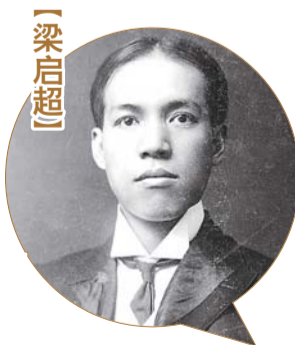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杜亚泉，这些人还包括康有为、梁启超等，在新文化运动中，他们被定位为保守派。民国初年，康有为及其弟子陈焕章等主张立孔教为国教，写进宪法，这激起了新文化派的强烈反对。

最早，易白沙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提出并探讨孔子问题。后来，陈独秀将矛头直接对准康有为，发表多篇文章，成为反对孔教的旗手。再后来，鲁迅、吴虞、李大钊等人跟陈独秀站到一起，对孔教和保守派开炮。

胡适、陈独秀等人以《新青年》为阵地，鼓动“全盘西化”，主张按西方标准看中国传统，哪些东西合用就用，不合用就都丢掉。康、梁、杜亚泉等保守派却认为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。

他们无法与旧文化一刀两断。在他们看来，文化不是衣服，想穿上就穿上，想脱下就脱下。

梁启超的门生张君劢说得透彻：对于一个民族或一个人而言，文化不



梁启超

是外在的、可以随意选择的工具，而是内在于人性、内在于历史、内在于主体选择的生命本身。所以，我们要有“思想的自主权”，即民族文化的本位意识。运用自己的思想力，尊重本国的固有文化，不跟着西方人的思想走，贵乎独创，不贵模仿。

梁启超则把这种文化的主体性解释为“国性”。“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，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。”而中国国性中有“至善美而足以优胜于世界者”，比如孔子的“仁学”。

梁启超、张君劢都被归于新儒家

旗下，梁启超可谓新儒家思想的开路人。

但对于梁启超来说，新儒家思想不是一开始就有的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之旅是他对于西方态度改变的催化剂。

1918年底，对政治彻底失望的梁启超来到伦敦，开启了他的欧洲之旅。他参观了曼彻斯特的工厂、巴黎的巴士底狱，看到曾代表世界潮流的欧洲物质文明，竟在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，陷入“一片沉忧凄断之色”。在他下榻的高级酒店连暖气也没有，火柴与糖都成了稀罕物品。好吸纸烟的他，自叹“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，只好强迫戒掉了”。

这让梁启超对自己和众多中国精英顶礼膜拜的西方物质主义、功利主义产生怀疑。“谁又敢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，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动摇起来？”“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，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。”

梁启超反观中国传统文化，在心理学中找到了解药。欧游回国后，梁启超将一系列游记公开发表，再次引起知识界重视。他在《欧游心影录》里反思：科学并不是万能的，一种注重精神的生命哲学对于人类建构现代生活体系必不可少。他开始重新肯定中

国的文明传统，认为儒家思想(特别是心学传统)不仅符合西方注重精神的生命哲学，而且通过更新能够转化出民主社会所需要的道德。

从崇拜西方科学、民主到回归儒家心学传统，已经不是梁启超的第一次改变。梁启超以“善变”闻名，有人说，中国近代史上每一个政治流派，几乎都能从梁启超那里找到理论支持，同样也能找到反对。

有人对梁启超的“善变”嗤之以鼻，认为这是他随机应变、制造轰动效应。在海外组织保皇活动时，梁启超就曾因为他的“两面派”同时得罪改良派和革命派。

但也有人认为他的每个选择都很真诚。他们觉得，正是因为梁启超学贯中西，他才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接近中西文化的本质。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剧变中，在不同的政治、思想流派中，梁启超都能深刻地看到各自的合理性。在不同的时期，他对每一种合理性都寄予希望。而梁启超能言善辩，不管他支持哪种主张，都能通过一支笔搅动起一股思潮。

“知我罪我，让天下后世评说，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。”对于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口水沫，梁启超写下了这句话。



齐鲁晚报

B05

一九一五，风云会

编辑：陈玮 美编：石岩 组版：刘燕  
2015年7月5日 星期日